

中华文化的南播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文化母题

许福吉（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hockkiat.koh@nie.edu.sg

目 录

- 一、“中华文化”的真谛
 - 二、中华文化的流动与南播：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
 - 三、文化母题的意义、特质
 - 四、文化认同母题的多元变奏
 - 五、寻觅家园与回家以后：文化乡愁母题的变奏
 - 六、战争与苦难：悲情母题的历史延伸
 - 七、山水因缘母题的彻悟与栈恋
 - 八、火焰的重燃：东南亚文学母题的传播、交际功能与价值
- 参考书目

一、“中华文化”的真谛

当我们在全球化的场域中讨论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或阅读方式时，不难察觉“中华文化”与文学轮转不息的生命精神，轮斯转，转斯活，这是一种重要的审美倾向。学界有一种观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明从西转东，二十一世纪轮到是东方文化的世

纪,这中间“中华文化”经历了不少的大反思。

“中华”一词最初是从“中国”与“华夏”两词中各取一字复会而成。“中国”一词原是一个地域观念,也是民族与文化类型的名称,不一定具有统一国家的实体涵义。而“华夏”的“华”原为图腾名称,意指花族;“夏”为自称,意指人。华夏就是指居住在中原,以农业为主,因此用谷子和黍子的花朵为图腾,衣服上有华章的部族。

历史的河流滚翻向前,中华文化也不断在承继与变化中创新。今天,中华文化基本上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其它少数民族文化为辅助的文化总体。在古代,除了印度、阿拉伯等偏远的文明,汉族王朝从未接触到能和自己相提并论的文化,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以汉文化为模式建立起来,和汉族接触越深,自己原有的文化保留的就越少,某些民族甚至完全放弃。

“文化”有着包罗万象的定义,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和克拉孔(Kluckhohn)在他们合着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列举出160多种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在这么多定义当中,较让大家接受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埃·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的定义,他认为文化必须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与习俗,以及一个社会成员所能获取的任何其它能力与习惯的整体。《辞海》、《辞源》对文化具有比较准确的定义: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模式叫文化。

宏观上,中华文化泛指对于知识、精神、美学等的系统描述,具有群体特征的信念、意识、价值观、行为、认识等,为群体所共有、传承,以价值观为内核,在特定习俗中,呈现出“物”化形态,可以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中华文化能够集中地体现具有同一性的文化典范。我们从一尊青铜器、一组编钟、一座古建筑或一个古村落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传统遗存物中所蕴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人们常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种说法也相应地呈现在文化格局中:外部看是“一体”,以汉文化为主导;自文化内部来看,则呈现出强烈的区域性特征,我们从具体的齐鲁文化、楚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可以看出端倪。

中华文化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不仅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更因为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例如唐代的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汉朝和唐朝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主体就具备这种条件,所以有佛教的良性传入、有和西域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中华文化是一个上下

几千年的文明连续体。

二、 中华文化的流动与南播：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

全球化与国际化带动中华文化研究，也给东南亚华文文学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全球意识趋势下，“天下大同”或许在某程度上会变成现实，而“相互同化、融合、一体化”也可能形成另类的“中心论”。¹⁾由于“同”意味着普遍化和抽象化，越是具体而微的东西，越容易遭到忽视和忽略的厄运。只有承认并保护文化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和发展自己。孔子所追求“和而不同”的理念，在这个跨文化流动与多元化的时代里，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地区，基本上受到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以中华文化为例，华裔学者与作家从历史传统、地理文化圈之间的“跨文化接触”（Cross Culture Contact），多年来形成了独特的“中华东南亚学体系”（China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ystem），²⁾它可以被用于解释中国与东南亚“接触”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海外华人社团与文化、商业网络建构意义，并肩负起对话、了解与推动文化发展的使命。对话、了解与推动文化发展，有助于突破民族国家的困境和语境，促进跨国界、跨文化的接触与推动，让各民族彼此包容、交融，并建立持久和谐的关系，在时间与历史的进展中，汇聚成动态的文化流动区，有助于推进由移民群体所带来的不同地理、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及其进程。东南亚作家和团体的时代特征，正在不断说明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东南亚跨界族群，在社会互动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随着全球汉语学习热的兴起，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愈来愈受到重视；考察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现象，³⁾不难发现不少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也成了课堂教材，引起了研究者、阅读者与学习者的兴趣，而“中国

1) 乐黛云，《寻求跨文化对话的话语》，见《跨文化对话》创刊号，北京跨文化研究中心，2003，页3。

2) 刘宏《中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64。

3)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仅以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四个地区的部分华文作品来讨论，实际上菲律宾、印尼、汶莱等地区的华文文学也有不少优秀作品，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再作研究。

东南亚学”的跨文化视野，也早已潜藏在许多作品中，他们从一定文化背景下的原型象征物中，获得体验的凝聚与题旨的提炼，使一些基本的文化母题得以赅续与诠释，例如“认同母题”，从移民认同、乡社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国家认同、阶级身份认同到多元认同，⁴⁾围绕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键词，如认同、战乱、离散、乡愁、漂泊、放逐、圆缺等，都与文化认同母题有关，我们从东南亚华文文学同一母题话语体系的各自独特性、文化整合与地域歧异、不同范式的交迭、互补和共生，可以深入了解作家与作品的实际状况，于借鉴中反思和创新。

三、文化母题的意义、特质

母题一词源于英文“motif”的音译，其词根“moti”意为运动、能动。motif原本是音乐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一部组曲中不断地反复地出现的一个旋律”，⁵⁾后来被引进到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中。⁶⁾国际比较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主题看成是抽象的，而母题是具体的，主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母题则具有客观性。文学母题与某一特定作品的主题之间的区别在于：主题本身体现的只是一个思维过程，是作家通过一连串的事件、意象等构成的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阐释；而母题则是一种基本的人类概念、精神现象或动作本身。随着比较文学的蓬勃发展，母题成为主题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歌德认为母题是一种“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⁷⁾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将母题阐释为：

一个主题、人物、故事情节或字句样式，其一再出现于某文学作品里，成为利于统一整个作品的有意义线索，也可能是一个意象或‘原型’，由于其一再出现，使整个作品有一脉络，而加强美学吸引力；也可能成为作品里代表某种含义的符号。⁸⁾

4)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页238-266。

5) 引自杨匡汉，《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页28。

6) 参谭桂林，《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2。

7) 转引自乌尔利希·维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页32。

8) 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页39。

从母题的性质看,凡是有文化传统的地方,就有母题存在,文化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逐渐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⁹⁾文化传统的因子一旦产生,就会在所属的文化群体中不断复制和再现,并伴随历史的延伸代代相传,这些文化因子就是“母题”。

母题交错是文学的一种最基本的状态。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中,单一的母题表达,一般都是由诗歌、散文的文类来完成,长篇小说则由多个母题交错而织。一个长篇以家族为母题,那么在这个长篇中一定会有婚姻、爱情甚至性爱这样的母题穿插交错其间。因为虽然每一种母题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体现,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立自足性的精神现象,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功能与叙事模式,但是各种母题之间有着本身的相关性和从属性。

理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化母题现象,必须沉潜到文本的母题变奏中,去寻找母题系统赖以存在与更生的内在机制。正是由于这些特性,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文化母题,具有十分广阔的理论空间,可以从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叙事学、比较文学等多种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考察研究。对文学母题的研究,也体现着当代人文科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打破学科界限、贯通古今中外的一块新天地。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母题与尺度,是世界华文文学维系其整合性的根本因素,对东南亚华文作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故从文化母题与华文文学之关联的角度去研究,有助于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作深度层次的解读,有助于寻求优秀作品内在的人文姻缘,也有助于以“文化纽带”增强离散于异国他乡的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四、文化认同母题的多元变奏

重复性的母题如一根生命的红线,紧紧地维系着一个文化族群在不同的疆界独特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延伸,也是作家肯定自我身份的探索形式。¹⁰⁾文化母题在空间上超越

9) 希尔斯·傅铿译,《论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页2。

10)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见《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238-266。

民族、国家甚至文化圈，在时间上它跨越不同时代，具有长期延续性，且不因具体时代文学潮流和时尚而改变。以郑和为例，我们从许多文学作品中看出重复性的母题如何在文化中延伸与建构。郑和可视为跨文化与中华文化异地生根的文化象征，历经六百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积淀，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经过的东南亚地区，早已形成了两个郑和：一个是中国历史范畴的郑和，一个是东南亚文化范畴的郑和。目前在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关郑和的文学创作超过百个，在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就流传着不同版本的郑和传奇与传说，并改编成不同的表演形式与活动。马来西亚轰动一时的大型歌舞剧《汉宝丽》，正是改编自东南亚的文学作品，这个结合宫廷文学与民间文特质的作品，内容主要歌颂华人与马来民族和睦相处、友好交往，以美好的诗歌意境与南洋传奇，交织成一种和谐的母题。这种跨越文化、族群、国界、语言的创作方向，一直被马来人和华人艺术家仿效。同时，从郑和下西洋开始，海外移民与东南亚所在国的人民友好相处，推动了经济与文化的蓬勃发展。鉴于郑和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东南亚不少作家执笔歌颂，当地人民也将郑和奉若神明，较著名的郑和寺庙也有十多座，基于深沉的历史积淀，许多地方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郑和的传说。

东南亚有关的传说中，郑和被赋予许多超自然的神力。这些仪式和庆典在历史的演化中，已经逐渐延续下来成为当地的习俗，‘郑和崇拜’并非形成于中国本土，而是东南亚各族群共同造就出来的，在郑和下西洋主要经过的东南亚地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当地各族群对郑和的热爱与崇敬，已经发展成为今天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特色。这种跨越600年的历史文化长廊而沉淀下来的有关郑和的历史记忆，已衍化成一种文化象征，它所代表和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所实践和追求的和谐、睦邻友好、和平外交，同时也是不同宗教与文化族群之间相互接纳、和谐相处、互动融合以及积极进取、不畏艰险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文价值，正是郑和留给世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南亚华文文学历经好几波的变化浪潮，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本土认同作品，这些作品的最大特色，就是融合了本土性与全球性，以泰华文学为例，在中国经济与软文化实力积极推动与影响下，泰华文学获得了发展机遇，相继复办或新组建的泰国华文日报如《世界日报》、《新中原报》、《中华日报》、《星暹日报》等都有精彩的文学副刊版，为泰华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广的发表园地，加上国际性的华文文学活动如火如荼，扩大了泰华文学界视野，许多优秀的作品富赋予了浓厚的潮汕文化色彩与湄南想

象，同时融入跨文化的现代性元素，形成泰华华文文学地缘美学的特征。¹¹⁾

东南亚的华裔作家大体上有由两种，一种是南来的移民，另一种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用华文创作，作家的身份使他们需要寻找文化的归属、认同和精神家园，新加坡作家张挥在《门坎上的吸烟者》中，借主人公之口追问：人生的归宿“为什么不是潮州的汕头”？在新加坡作家心目中，中华传统的枝叶联系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潮州的汕头等类似的地域文化，代表着部分作家的精神上的最后归属。

非心对籍贯所在地“潮州澄海”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澄海在我的心里是一个诡秘而又实在的地方。那种既亲切又陌生的矛盾之感萦绕着，久久不息。祖母已说不清澄海的样子，爸爸已忘记了澄海，我还在坚持寻找自己的出处么？”这种寻找的热情，正是寻根的文化特质，籍贯是祖先所在的地方，代表一种遥远的家乡的记忆，也表示生命因此有了安顿之处，并非永远的漂泊无依。

黄孟文《最后一次扫墓》描写“忘祖”的现象，《焚书》描写华文失落的情景，揭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伦理道德的解体、新一代华裔新加坡人数典忘祖与华族文化的式微。周黎作为华族根性文化的拥戴者，他的微型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罚》一文，作家借夫妇对话，描写华族伦理道德中父母宠爱孩子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梁文福在《再生盟》里说“今天我以自己渊深丰博的文化而自豪”，可见，作家是以中华文化为荣，继承着“炎黄子孙世代相传的温良性情”。

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倡导多元种族文化的和谐相处，提倡国民认同与强化国家认同意识。中华文化在异域解体，并表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对中华文化的探寻，转化成对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然而，伴随着本土化而来的，是华文的衰落，这一点，对文学作家来说，可谓刻骨铭心。传统人文精神与价值观的失落，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表现得越来越广泛。希尼尔的大量作品，表现了新加坡华人精神文化遭到连根拔起的困境，其中《变迁》以卜告的形式，描写了刘氏家族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变迁，在短短的30年间，刘氏家庭完全西化，这正是新加坡在发展过程中，个人和社会西化的一个缩影。

我们从东南亚华文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不少作品潜藏着一种普遍的深层意识趋向，

11) 刘小新《论泰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总体特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3期。

形成许多文化人的主导心理倾向。在面对后现代文本的跨越与整合上，在思想上显得较开放与多元，并能配合全球化时代的步伐，强烈地创造出文化人的关怀意识。东南亚华文作家创作的题材、思想、风格，也逐渐从早期的“南洋色彩”，¹²⁾ 转变到“国际都会文化”。¹³⁾ 作家以文化的审美价值为主轴，强调人的个体价值，提升生活素质和美化人生为创作的基本素材，将亚洲的人文关怀，推向一个极高的境界。东南亚华文作家立足岛国，放眼世界，心怀寰宇，对多元文化体系、社会环境变迁、都市意识形态，作出恺切的响应和反思，蔚成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文精神，保持著作家一贯自身的人文尊严。

五、寻觅家园与回家以后：文化乡愁母题的变奏

“乡愁”与“羁旅”母题源自传统，从屈原、李白等开始，漂泊、游子、鸿雁等是古典诗词中频频出现的关键词，历经千百年积淀，已汇集为主题、形象而构成文化母题。这一文化母题，早已嵌入东南亚华人心理结构的底层，成为文化遗传的基因密码，流淌在华人血液中本能化的情感之一。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把华人那根最原始的情感心弦拨动得铮铮作响；余光中“乡愁是一枚邮票，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让海外游子感受到在贯以千古的文学脉管里，一直都在流淌一股乡情的血流，那无尽的“乡思”与“乡愁”，更像作家诗人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情歌，表面上看似单纯情感的“乡愁”，背后其实隐含有深厚的涵义。

越南华裔作家千瀑，一度曾过着血泪交织的逃亡生活，他的代表作《手表》虽写款式陈旧的手表，内心却这么想：“光泽暗淡的表带/仿佛仍弥留着母亲当年手上的温暖/这

12) 南洋、殖民地与多元文化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提供了新加坡散文作家不少写作的素材，形成独特南洋图像，许多散文作家从热带雨林的植物、飞禽、水果、生活习俗等取得灵感，创作大量富有南洋色彩的精美散文，如王润华《雨树》、《沉默的橡胶树》；南飞雁《九重葛》；林臻《火焰多多缀满枝》、《喜啖榴槤六月香》；李艺《椰林满园的漳宜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展现出独特的南洋风采。相关论述详见许福吉《移民、文化认同与文学书写：新加坡散文人文关怀论述》，收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百花州文艺出版社，2004，页112-130。

13) 参见蒋淑贞《都会文化VS本土认同-新加坡英文文学之定位》，台湾大学，《中外文学》卷25，第9期。

温暖，一点一滴/像表链断了的今天/只因为断了才越发/有一种依依的什么/在恍惚的时空里回旋”。诗人因陈旧的手表而激荡起惦念慈母的情怀，这种思念的感情是那么纯真、自然，并在宇宙时空里不断散发，然而诗人要写的还是一种怀念家乡的情愁，他以“指标上的时间/看来应该还停留在/我离开家门的时候/漫天的风风和雨雨。”可以感受到诗人，是多么渴望回到他的家乡——越南的怀抱。虽然他的家乡仍处在战火声中，由于诗人热爱自己的家乡，深爱自己的祖国，所以他于一九八七年八月写于西雅图市的《回乡》这首诗，就坦率表明回乡可真不容易：“梦里的家乡/只能到梦里去寻寻觅觅/……在梦里排着队/……从人群里认出消瘦的家人/……和家人简短的问答/……每次总是这样/呜咽着……”从这些作品，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思亲、思乡的复杂心情。

乡愁、漂泊、悲情，是这些作品的文化母题，其实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是“游子”，寻找着精神的家园，乡愁母题向上的发展是个体将“小家乡”概念升华为“大家乡”概念，将个体对某个特定地域的深挚爱恋，扩充进化成对整个民族、国家的深挚爱恋。对于新移民来说，温饱之后为自己的边缘地位而感叹。许多海外华人作家因无法进入居住国德文学主流，为自身难以进入居住国主流社会而不平，于是“从边缘走向主流”已成为新一代和老一代华人的共同心声，乡愁母题的发展趋势是走向主流文学。早期的东南亚华文作家，由于他们的离乡，都是带着极度的无奈、彷徨与迷茫，不知出路在哪里，而思乡、念亲、怀友的情绪更时时地纠缠在他们心中，所以表现出来的文化乡愁，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思乡与返乡情结，例如马来西亚作家梦笔在《思乡》中写道：“几易沧桑寒暑，家乡硕望归思切；三千道路老魂飞，尺寸音书随鸟绝。”表达了浓烈的盼望回归的心理。这种情愁，与东南亚出生与成长的第二、三代华人作家，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也起了新的变化，他们大部分视出生地为自己的家园，但又忘不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因此就有了国籍与文化家园两种身份，到了新一代华人，由于中国政策的改变，许多海外华侨都可以回国探亲。这对于一直想归而不能归的游子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简直是难以相信。然而回到了故乡，一切都已改变，不少作品也感叹“土地依然香，只是时光不再。”流露出一种文学创作中常出现的沧桑感，感慨人事的变迁。马来西亚作家李雄之与翠园有不少感人肺腑的文化乡愁散文。李雄之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写离开故乡48年后才回到故乡，故乡的人、事、物都发生了改变，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故乡的眷恋。翠园的《乡愁与美食》，文章中的“我”是个“远迁异国38年的老华侨”，然而去国思乡，故乡的山川景物、风俗人情，以至“那些梦寐以求的美食”，令我难以忘怀。岁月无情，38年

后，“我”真的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见到多少回在梦中见到的亲人和“如诗如画的景色”，却有一种时移境迁的沧桑感，心中浮起“无限惆怅。”上述作家所呈现出来的乡愁，早已不同于早期作家的作品，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乡愁，不再带有彷徨、苦闷、憎恨，而是有一种终于可以回归故乡的激动、喜悦，同时又表达了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侨民意识逐渐减弱，而本土意识逐渐增强，在东南亚出生成长的作家，他们视东南亚为乡土，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乡愁不同于先前的作家。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家为例，他们到国外深造，新马成为他们思念的对象，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乡愁不再带有苦闷、彷徨、惆怅，而是一种对故乡文化的怀念。王润华的散文《我家水井的生鱼》一开篇就说自己因为思念故乡而大哭，他把东南亚的华人，比喻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鱼，而且是喜欢旅行的动物，在下雨天四处徒步旅行，不断寻找新的湖泊河川。喜欢旅行的鱼，活在井中，简直是坐牢，后来作者才明白生鱼的痛苦。这篇散文写生鱼在静中岁月的安宁，又想永远离开暗无天日的井底的矛盾挣扎，这就是东南亚华人的写照，作者通过生鱼的遭遇，表达东南亚华人和自己对人生深刻的感受，抒发了自己身处异地他乡的感受和对家乡的思念。南洋、殖民地、多元文化与现代化都会等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提供了东南亚作家不少写作素材，形成独特的南洋文化风味母题，《我家水井的生鱼》以诗意的句型、清丽的意象和颇具南洋边缘的风味母题，是一种文化乡愁的变奏。这一类型的作品还包括马来西亚作家苏之玲的《老屋》、章钦的《捞起一片故乡情》、文戈的《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苏之玲的《老屋》写作者童年时住过的槟城老屋，槟城的市容这几年改变很多，老屋早已不存在，但是每年返乡度假，踟躕在槟榔路街头，举目四顾，总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淡淡乡愁。章钦的《捞起一片故乡情》也是用抒情的笔调，写出回家的喜悦和追忆往事所引发的哀愁，感人肺腑。文戈的《乡音无改鬓毛衰》写了童年趣事和人事变迁。这些蕴含在文字中的乡愁母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从它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由当初的侨居意识、漂泊感逐渐发展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也慢慢沉淀下来。

六、战争与苦难：悲情母题的历史延伸

战争、苦难给人类带来悲惨遭遇，也赋予作家以悲情投入人生与文学创作，悲情成为了历代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蕴含悲情母题的文学作品往往更能打动读者，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战争使颠沛流离的作家更了解苦难，也更加深刻地表述逃亡、挣扎、思念等悲痛母题，东南亚的越南华文作家由于长期处在战乱，在这方面有不少感人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创作。在东南亚近期的不少文学刊物中，我们阅读到不少旅居世界各地的越南华裔诗人，通过诗句来阐情述志，¹⁴⁾以抒发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悲情母题。心水的《四月秋风》向海外哭诉：“冷酷的母亲打开地狱门/五十万子女的尸体/乱迭成一个大问题。”那是“湄河水流成血”的悲剧。他的另一首《赌命》则哀诉“蔚蓝之水、冰凉之水/翻脸就噬下/一船又一船的生命。据说红十字会……都不能统计充当鱼群食料之船民/究竟还有多少？”描述了越南难民十五年来沉尸海底的无数可计，诗人对这群不幸的“海魂”深深地表示“悲鸣”和祭祀，呈现出一种申诉、哀怨的悲愁。

现居于北美洲的越南华裔作家丹流的作品《渡》，同样反映出阵或逃亡国外的痛苦心态“惶惶饮吻熟睡的稚脸/欢聚反叛诺言/背上行囊/背上伊的两行珠泪”。把遗弃子女和家园的最大不幸事写得十分悲天悯人。居于旧金山的陈大哲尝过炮火的生涯，他的《鸽子》表示：“鸽子/飞/不该飞的地方飞/不该飞的时间/于是乎/衔去了和平”。庆全的《照明弹》和《逃亡》也直接或间接反映越南人民遭受战火侵袭而内心有着痛苦的伤痕与恐惧。《照明弹》写道“流星竟猝然冲向硝烟/闯进残旧的街角/惊吓了无数……此后/孩童不敢仰望天际……”可知越南人民随时随地都在恐惧中生存！越华诗人梦诗的《示威》、《想》、《中国河》、《我回来了》、《我曾走过你的身边》也都是反映炮火生涯的景致。《示威》这首短诗，颇具现代诗味，诗人以“举起森林的手/不，乞丐似枯干的手……讨回每个照不到的角落”来表达数以万计的越南难民的悲惨遭遇。

早期来到东南亚的华人由于经济困顿，或其它种种原因，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南洋，以血汗争取微薄的工钱，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早期东南亚作家的华文作品不少就反映了下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加上长久以来东南亚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悲情母题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不断繁衍，其发展路向大致分为炼狱式悲情与狂狷式

14) 参见《越华新诗专辑》，收入《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二十三期。

悲情。马来西亚作家韩萌的《花会》、张金燕的《悲其遇》、宁舟的《虹色以外》等小说，都是悲情母题的代表作。张金燕的《悲其遇》的陈慧莲，因为误解自由，过着浪漫生活，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以致悒郁而死。宁舟的《虹色以外》从母亲抛子别夫而给儿子造成的伤害，表现了恋母情结造成的另一种悲剧。韩萌的《花会》描写了战后初期，马来西亚下层社会妇女的不幸遭遇。小说主人公花猫嫂从沦陷时期就开始处于十分窘迫的家庭生活境地：丈夫被日本宪兵抓去修铁路一去不返，家里三个儿女嫩小年幼，嗷嗷待哺。她摆香烟小摊养活家人。不幸的事接踵而来：警察和暗探以恐吓手段不时来拿免费烟，使她小生意无法做下去；大儿子病死，二儿子脚上烂了大洞，怎么都医不好。自己和女儿又常患疾病，身体虚弱。这样，收入没有，药费开支大，加上物价不断上涨，政府配给物又少了许多，使她一家陷入生死危机的边缘。不得已，她打算牺牲自己的肉体，博取花会场包牌大龙头一个坏男人说出花会开牌号码。岂知，当她正要找上大龙头时，却在门外听到大龙头正与另一女人在私下恶言侮辱她。愤怒下纵火烧了那女人的房屋，自己过度恐惧而投河自尽。花猫嫂是不幸的，在她身上涂抹着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不同的时代背景，产生不同的文学作品。东南亚的许多文学作品带有时代色彩。东南亚的华人由于处于社会的底层，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过着悲惨的生活，自然就使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呈现出悲情母题。

新加坡作家苗秀的《还乡》也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中苦难、悲情母题的代表作。女主人公静子十年前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热情女子，从内地小埠头投身到大城市，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为了向往大城市的闹哄哄的生活，她把初恋丢在了故乡，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大城市，但是现实粉碎了她的梦想。二十八岁的静子在这个城市里结识了一个十九岁的少年，他们在一起，她认为这可能就是幸福，想拚命抓住它，怕它溜掉，但是她失败了。她失败的原因是：自己是二十八岁，他才十九岁，这是一条没法越过的鸿沟。他们是永远没法共同生活的，陈旧的思想、传统的观念毁了她的幸福。她离开那个曾经带给她欢欣也带给她伤痛的大城市，返回故乡，准备重新拾起她的初恋，她希望“幸福还是可能的。”然而当她来到故乡，来到初恋情人任教的小学校时，学校里静悄悄的，没有学生上课，一打听，原来是初恋情人去世，小孩子全去送殡。这对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当头一棒。她想拥有幸福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了。“那当子刚好是战火结束时期，多少年青人教时代的激流冲击得热血沸腾。”年青人凭着一腔热情而盲目追求理想的时代病，

造成了静子的悲剧。回到故乡，有些事物依旧，但有些已不复存在，特别是留下初恋踪迹的小河两岸的青草地，现在是一条齐整的街市，有砖头住宅、店铺。这就意味着她的初恋已经消失了。故乡给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而今天她带着一颗受了创伤的心回到故乡，本来是想来疗伤的，但是现实却在她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正如小说开头引用韦庄的话：“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泰国华文作家李栩的代表作《火砬头家》与巴尔的长篇小说《湄河之滨》，是两部有代表性的悲情作品。李栩《火砬头家》以小说的形式表述了一种时代苦难、悲情与对理想的向往与破灭，故事以泰国城乡的小型碾米厂为背景，写出口洋行、关税局、稻米主管机构等的复杂关系、斗争与残酷，深刻地反映“谷贱伤农”的社会矛盾，整部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与现实价值，传达了人物内心的悲与怨、恨与怒，反映了小人物在生活线上的挣扎，勾勒出一幅雾锁南洋的悲惨画面。巴尔的长篇小说《湄河之滨》充分体现了狂狷式的悲情，这部力作围绕着曼谷嵩越路上大富豪章家第二代衰败沉沦的经历，并辐射到华社和泰国各个阶层以及三教九流的遭遇处境，可以说是当今泰国华社现实生活的缩影。作者借着故事的开展和对人物的描绘，揭示出社会的畸形、怪诞、阴暗与齷齪，并给予尖锐的讽刺批判，企盼人间的公平与正义早日到来。上述两种炼狱式与狂狷式的悲情，可说是悲情文化母题的再现，也是“诗可以怨”的历史延伸，不难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矛盾的《子夜》等小说，所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要改造的是国民性的病态与丑陋，东南亚华文文学借此种能力意识转化，从而使悲情母题的变奏与新质，得到历史与现实的求证。

七、山水因缘母题的彻悟与栈恋

山水母题具有原型母题的三个主要特征：与人类亘古之梦相连、很强的文学伸缩性以及超越时空的延续性。东南亚华文文学山水母题主要体现在：乡愁情感的归依、本土意识的认同以及生命意义的寻求。新加坡作家张曦娜《无调之歌》对闽南山水景致、人情风俗的描写细腻地表现出对父亲深沉的怀念和追思，以及作者对父亲的或者“我”的内心深处的故土、亲人荡气回肠、生死不渝的牵挂与眷恋：“渺万里层云，只影向谁去

？”张曦娜的深刻还在于她指出，在这个崭新的新时代，父亲的故土上依然上演着“离乡漂泊的悲剧”，然而，现在的游子可曾有“父亲”那时的踟蹰和怆然？在新加坡，面对街头茫然的少年，“我”刻意的笑了，“好像遗忘了自己”。其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对“故园中国”的眷恋和关怀，还包含了“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的那种无力的爱。

80年代，经济上的强盛绝对支持了人们去到世界各地旅行的物质条件。旅行成为风尚，随之而来是东南亚文学涌现了大量的游记作品。文人们纷纷走出东南亚，放眼外域的风光。从枫叶飘洒的加拿大到美国尼加拉瀑布的壮观；从瑞士皑皑白雪到澳洲的旷原海域；从中国到日本。为的是获得超脱平庸现实的生活，获得某种浪漫的体验。浪漫应该只是其中一种的目的，充实阅历并表现、分享经历之所感所见，更成为游记写作的推动力。阅历与经验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而文学在一定形势上是经验的记载，将经验、阅历、感悟一同呈现在社会大众的面前，对作家本身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责任，让见识传播，让感悟流传。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股源动力。这种出走，奔赴于异域，奔赴至自然山水的原动力，可以说与中国山水文人最初的本愿有根本的相同、相通。尽管作者受到新生活的影 响，但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华族文化情节始终不曾远离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欧清池的《流泛着山居幽静气氛的帕斯》，渲染了一种优美恬静风光。芳芳的《纽西兰随笔》充满了对悠闲生活的向往。王润华的散文集《秋叶行》，时空跨度极大，由美洲到亚洲，由历史到现实，作者的行走足迹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陈华淑的游记《飘飘雪夜报冬寒》、《冰灯辉映的晚上》；石君的《行踪》；林臻的《风下游拾》；吴绍葆的《花都八月》、《巴黎红爪》、《东西欧游记》，作者边走边写，边思边议边悟，呈现出山水母题文化的基本特色。不同的是，在成长于东南亚自身的社会文化中，这些作者所表现出的是对人生的积极的关注，而非古往山水母题中单纯的自然美感与超脱意境，有更加积极的入世观在里面。这一点也正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山水母题的演化与走向。游历文化古迹，历史胜地，以各种文学形式抒发感怀。周颖南的《槟城纪行——华侨抗战纪念碑》在文中摘录了槟城华侨抗战纪念碑文，作者即在怀古，也在谏今，希望今天的人们牢记曾经的苦难。尤今的《人间地狱》记叙参观旅顺日俄监狱旧址，介绍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军民的种种暴行。“血的历史，活的教训”，文意昭示后人：铭记历史，不要重演人间悲剧。

现代文学中山水母题的呈现，是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探索之旅，作家逃离都市文明的情结是有的，但最终的回归多在认知的升华，而非形式上的索居。现代的游记中，注

重反映异域文化个性和时代精神，每到一处总能捕捉到该地自然与人文的特色及其历史传统的含义。《风沙雁文集—序》中写到“这种愁思来自对本民族文化日渐消失的担忧，也来自社会上少有参与感的落莫，而我却无从参与的无奈”。他将南大湖浊黄的水喻为“海外华人对母族文化的相思泪”，他的散文体现了对海外华人的文化传统和现状的深刻思考。《背着文化走天涯》中，他明白了“五千年的文明已逐一化为我的血液，我不止带着我族历史的色彩，连观察也带着历史的色彩。”这种慨叹成了东南亚游记中其独特文化背景的一种折射。

泰华作家司马攻的散文《轻风吹在湄江上》、《尽在不言中》、《明月水中来》、《湄江消夏泉》等题材均以“思乡怀旧”为主，其艺术构思独特，文笔质朴简练，每篇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极富感染力。诗人岭南人的诗集《结》、《上管短笛》、《咏》、《回到故乡的月亮胖了》和《无歌也无泪》等名篇，都是来自生活感受和心灵的领悟，淡中见真、朴素畅达的特色，在平易中给人以深意，在素淡中给人以美的感受。李少儒《未到冰冻的冷流》、《五月总是诗》和《桥》等诗风含蓄、凝炼、典雅，洋溢着现代精神和创新意识，黄重先的《许乌仕和他的运输马队》、陈博文的《抉择》、刘扬的《岔道口》、黎毅的《瞬息风云》，他们的作品总是将洞察力与真情实感融合在一起，将外在的世界与内心的涌动联合在一起，使到今天的因缘、山水文学再也不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

八、火焰的重燃：东南亚文学母题的传播、交际功能与价值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在历史的轨迹中，印证了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出他们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欧洲作家，能不断的吸收不同文化的元素，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母题，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每一种母题都可视为人类精神现象，也是作者对现实的揭示、表现，既有继承性又有开创性。从继承性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中爱情、羁旅、复仇、悲秋、伤别等等母题，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数据与艺术资源。文学母题有反映生活的功能，但更有批评、干预和引领生活的作用。自从人摆脱原始自然

的生存方式，进入到现实的生存方式以后，人的感性、知性在把握世界时常受到外界的影响，他从根本上说是不自由的。作为一个时刻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自觉主体的作家，总期待着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己。各类的文学母题正提供了人实现这种期待的可能，使他在创造或接受时，可以经历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可以在内心深处对这世界发表一己独立的见解，体会到自由超越的乐趣。

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所呈现的文学母题，既可以表现生活的种种伪美与假善，并适度地予以容忍，让读者感到它有切近人生的真实与可信，更重要的是，它还批评它们，让人看到其如何的不合理，从而至少在那个时刻，把自己交给了神圣的真理与正义，进而培植起理想，涵养出道德，抚平心底的创痛，获得前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各文学母题是站在生活的反面的，通过批评，它使社会保持了健全的理想，同时也因与生活的反差，成就了自己的价值。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说：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¹⁵⁾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南亚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的发展，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多元发展的新局面，这也是一种跨文化流动、跨国界对话，它环绕着文化冲突、生物学发展、伦理道德、多媒体网络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使东南亚华文作家的悲痛和历史记忆仍然很有现实意义。

15)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页14。

参考书目

- 朱迪光,《文学研究中母题概念的界定》,文艺报,第五版,2005。
- 王列耀,《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杨匡汉,《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
- 许福吉,《移民、文化认同与文学书写:新华散文人文关怀论述》,收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百花州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112-130。
- 胡经之等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阎嘉,《多元文化与汉语文学批评新传统》,巴蜀书社,2005。
- 杨宗翰,《世界华文文学的教与学》,《文讯》,第236期,2005。
-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 谭桂林,《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Abstract

Transculturation and the Motif of Southeast Asia Chinese Literature

Koh Hock Kiat

Globalization and Transculturation mad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eight parts and subjects treated in each part are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Transculturation, and the motif of Southeast Asia Chinese Literature. Part one to part three aims to draw up a theoretical base for Chinese Culture which relates both Transculturation and Motif. Part four to part eight deals with the trends in "The Basic Rules for Accurate Motif" These Rules were derived from a draft by Professor Yang Kuanghan in 1999 and latter reviewed and modified. This paper aims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key words on Motif of Southeast Asia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 Chinese Culture, Southeast Asia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culturation, The Basic Rules for Accurate Motif